



周易

〔修订版〕上册

郭彧
注译

 华龄出版社
HUALING PRESS

目录

序
前言
易经上
一 乾
二 坤
三 屯
四 蒙
五 需
六 讼
七 师
八 比
九 小畜
十 履
十一 泰
十二 否
十三 同人
十四 大有
十五 谦
十六 豫
十七 随
十八 蛊
十九 临
二十 观
二十一 噬嗑
二十二 贲
二十三 剥
二十四 复
二十五 无妄
二十六 大畜
二十七 颐
二十八 大过
二十九 习坎
三十 离

序

《周易》一书作为中国早熟的思想文化体系，它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，已为世所公认。《周易》被称为六经之首，就是一种证明。传说孔子著《十翼》以解释和阐发易之道，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沿袭“象以尽意”，超越常规语言，或以诗或以寓言阐发自然之道，禅宗“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”，弘扬“自性”开悟之道，由此表明中国传统儒、道、佛三家，实际上都有以《周易》为源头活水的意味。不过必须承认，《周易》是一部非常难解之书。特别是上世纪初，中国经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而与传统文化断裂，以及随着教育制度“西化”对中国特长之“象思”集体失去记忆，从而从那时至今，使几代学人进入《周易》和领悟其本真本然之意，变得非常困难。这里发生的问题在于，《周易》产生的思维方式，显然不是在教育制度“西化”中所接受的理性的逻辑概念思维。但是，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降的学人，却恰恰是用这种与《周易》不相应的思维方式领会《周易》。

简要地说，《周易》的“象思”可以归结为“观物取象”和“象以尽意”。这八个字，看似简单，却字字千钧，内含“象思”无限深邃之意蕴。这里的“观”，首先是指具体直观，但是却不归结为具体直观，而是包含超越直观的许多层次。如意象之观、理智之观，等等，一直到《老子》所谓“大象无形”之观。在道家那里，“大象无形”之观，就是体道而通于道的悟性之观。《老子》所说的“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，常有，欲以观其徼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

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，正是描述体悟而通于道之观。可知，对于古代巫师借《周易》作种种预测的“观物取象”之观，决不能认为只是具体直观。就是说，这种“观物取象”之观乃是经过观的多层次而达到悟性之观。唯如此，才能在天地人“三才”一体相通中，或在与动态整体之易道相通中，做到接近事情本真的预测。不难理解，“观物取象”之“象”，乃是与“观”的层次相适应。只有进入悟之“观”，才可能领悟“大象无形”之“象”。或者说，由此才能进入天地人“三才”一体相通的境界，并在此境界中，以通于“大象”之象“尽意”。因此，“取象”之“取”和“尽意”之“尽”，并不是说有现成之“象”或“意”摆在眼前待取，而是要经过如《老子》所说“玄之又玄”的体道和悟道过程，才能有所“取”与有所“尽”。

由各种经典展现的不同思想文化，其所以本质不同，都因其产生的思维方式不同。因此，为能本真地领会和把握一种思想文化，就必须首先对于不同经典得以产生的思维方式有所领会。现在的中国学人，对于《周易》以及其他中国传统经典在领会上发生的问题，如前述，就在于对于这些经典产生的“象思”失去记忆。这样，首先在领会经典本真之意上就发生进不去的问题。概念思维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学人的思维定式。例如，有人写文章解读《庄子》时，提出其文的逻辑起点如何，逻辑结构如何。不难看出，这种提问方式和观察视角，就不对。这种思维方式，不仅与《庄子》之文诗意的寓言不相干，而其所论，其结果也只能是生硬地切割和肢解庄文。对于《周易》的研究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。

但是，近来读郭彧先生注译《周易》，却使我眼前一亮。郭先生称自己的《周易》之书为“新注释”，读之确实能感到其新。而其新主要表现在体察视角的转换，把作为《周易》思维根本点的“象思”和借助“象思”解读《周易》突显出来。这首先表现在消除对王弼的误解。许久以来，王弼一直被认为是《周易》从象数研究到义理研究

转向的始作俑者。甚至把这种转向，称为“王弼扫象”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而且正是王弼在《周易略例》中，把《周易》思维的“象思”特点明确地指出来了。所谓“意以象尽；象以言著”。在由这八个字所表达的思维活动中，“象”的中心地位非常清楚。事情本身的“意”或其本真本然，或“道”之意，都是由“象”尽之。这个“象”既表现在阴阳爻的卦爻符号，又表现在卦爻辞的语言。所谓“象以言著”，不过是说卦爻辞的语言在《周易》那里也没有离开“象”这个中心，言所著的仍然是“象”。也就是说，对《周易》卦爻辞的领会也要以“象”为出发点，能区分出《周易》卦爻辞之语言不同于纯义理的概念语言之特点，或者说要把握《周易》卦爻辞“象语言”（此“象语言”概念为南京大学教授李曙华与我通信讨论“象思维”问题中提出，很有创意。——老树注）的特点。

正是由于郭彧先生找到了适合领会《周易》本真的视角，或如他所说的“观象系辞规则”，所以他解释《周易》时能出新，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。这个新视角就是“象思”的视角，它超越了把卦爻辞只看作纯义理的概念语言的视角，而能看到卦爻辞在本质上乃是以语言筑象，因此在本质上卦爻辞仍然是“象以尽意”。这样，在对卦爻辞的领会上，就不限于字义层面，更重要的还要从其筑象的层面，领会其“象以尽意”的本真本然。不难看出，郭先生开其对《周易》的新解，对于许多卦辞爻辞作出与流传诸解不同的新解，盖源于这样对卦爻辞的新认识。同时，可以看到，郭先生这种新研究和发现，也是他长期研究易学史而能继承先贤和前辈洞见的结果。如他指出，早在汉代，西汉焦贛在《易林》中就把“象”之于《周易》的根本性指出来了。而现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，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焦贛在《易林》中关于“象”的观点。郭先生这种研究，还使他对于《说卦》能提出崭新的观点，如指出虽然《说卦》出书比其他《易传》晚，但其后面所说的八经卦之“象”的内容，却是最古老的文字。郭先生由考

据所作的这一发现，意义重大。因为，《说卦》八经卦之“象”内容非常古老，正好说明先圣原初对卦爻系辞，正是从“象”出发，是以言筑象来“象以尽意”的。

明确了卦爻辞除了概念义理层面，还有超越概念义理的“象”层面，对于领会《周易》本真内涵，具有关键意义。就是说，在《周易》中有两种“象语言”：阴阳爻的“象语言”和卦爻辞的“象语言”。两种“象语言”都是为了达到“象以尽意”的目的。但是，问题揭示至此是否就结束了呢？还没有。因为，《周易》之“象”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，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体一体相通的。如郭先生揭示许多卦爻辞，从其“象”的层面看，包含不少描述卦的转化，而描述卦爻的可转化性，也即描述卦爻的动态整体性。这就提出了如何把握具有动态整体性的“象”之问题。显然，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，还没有现成的答案。因此，我认为郭先生的研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。他注译的《周易》具有开风气的韵味，是值得一读的。但是，此间问题还多多，还有待深入研究。如“象”和“象以尽意”，因“象”的动态整体性而非常复杂。在我看来，无论阴阳爻的“象语言”，还是卦爻辞的“象语言”，都因其动态整体性，而具有不确定性。因此，其“象”是否只有一种？显然，这也是有待研究的问题。以上所述，是我在读郭彧先生大作时所思所想的一些看法，就以这一读后感为之序。

王树人（老树）

2006年5月11日写于北京海淀区上庄镇常乐村

前言

《周易》向来被称作“诸经之首，大道之源”。今见通行本《周易》有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两部分。《易经》里有六十四卦的符号及卦名，还有卦辞与爻辞。据说成于西周（前1046—前771）初年，是用以取代龟卜的占筮之书。倘若如此，《易经》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。据说《易传》出于孔子（前551—前479）。倘若如此，《易传》的历史也有二千五百多年。今见通行本《易传》有《彖传》《象传》《系辞》《文言》《说卦》《序卦》和《杂卦》七篇。古人分前三篇各为“上”与“下”两篇，于是共成十篇，也称作“十翼”，意思是辅翼于《易经》的解说文字。我们今天看到的《周易》，是东汉灵帝熹平年间（172—177）刻石而定的“通行本”。距今也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。早在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中就有一些运用《周易》进行占筮的卦例（计有二十二条）。历代解说《周易》的书，可谓汗牛充栋。南宋的郑樵针对《周易》的学问，说“《易》有十六种学”，主要有“传学”“注学”“章句学”“图学”“数学”“讖纬学”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古今的易学著作将近有七八千种，现存于世的也近三千种。今天我们看到历代解释《周易》的主要著作，在清修《四库全书》经部易类里面，有《子夏易传》至清代翟均廉的《周易章句证异》一百六十八部。在2002年4月完成的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的经部易类里面，有《帛书周易》至《古三坟书》一百四十三部。至于民国以来的大量易学著作，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。在众多的易学著作中，就其历史影响程度而言，大概要算魏王弼的《周易注》、唐李鼎

祚的《周易集解》两部书的影响面最大。其后北宋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和南宋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也对元、明、清三代的易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。近代以来有较大影响解释《周易》的著作，主要有尚秉和的《周易尚氏学》和高亨的《周易大传今注》等书。

历来对《周易》的解释，分为两种派别。一是“义理派”；一是“象数派”。如，王弼、程颐、高亨等就属于前者；李鼎祚、尚秉和等就属于后者。当前对《周易》的解释，也有两种情况：一种观点把《易传》看成是《易经》的唯一标准解说，认为“孔子作的《易传》”已经把《易经》的深邃涵义发掘殆尽，只要遵循《易传》为标准进行再解释就可以了；一种观点认为《易经》的卦爻辞与卦象之间必然存在内在的联系，要通过“寻言以观象”和“寻象以观意”的方法对《易经》进行全面的诠释。

尚秉和前辈说：“悲哉，《易》之为书！自东汉迄今几两千年，总九经之注不如《易》一经之多，而《易》义之晦自若也，误解相承如故也。李刚主曰‘《易》两千年在漆室中’，真信心之言也。盖《易》之为书，义尽在经中，说皆在经外……夫易说、易象，解《易》之根本也。观春秋人说《易》，无一字不本于象，其重可知。失其说，亡其象，而强诂之，不犹瞽者之辨黑白、聋者之听音声乎？必无当也。”《周易》的符号系统，必须事先赋予其一定的含义，也就是事先制定一些“规则”，然后才能“观象系辞”。否则，今见《说卦》后面的“乾为天”“坤为地”“震为龙”等说八经卦的象征意思，就会毫无用处；《系辞》中所谓“圣人设卦，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”，也就成了一句空话。

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卦有卦辞，爻有爻辞，其中的每一个字都不是虚系上去的，都有其“观象”的依据。那么，都有些什么“原象”可观呢？

清代的大学者黄宗羲于《易学象数论·原象》中说：“圣人以象示人，有八卦之象、六画之象、象形之象、爻位之象、反对之象、方位之象、互体之象，七者而象穷矣。后儒之为伪象者，纳甲也、动爻也、卦变也、先天也，四者杂而七者晦矣。吾观圣人之系辞，六爻必有总象，以为之纲纪，而后一爻有一爻之分象，以为之脉络。学《易》者详分象而略总象，则象先之旨亦晦矣。”如果按照黄宗羲的说法，只用“原象”而不用“伪象”，就能够把《易经》的卦爻辞解释明白，那么就没有必要涉及“伪象”和汉代人的一些衍生之象了。

王弼于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中说：“夫象者，出意者也；言者，明象者也。尽意莫若象，尽象莫若言。言生于象，故可寻言以观象；象生于意，故可寻象以观意。意以象尽，象以言著。故言者所以明象，得象以忘言；象者所以存意，得意以忘象。”后来有人说“王弼扫象”，这实在是对他的误解。如果他没有把《易经》中的卦象看得十分明白，怎么能说出如此精辟的话来！以笔者读书所见，历史上最能把卦象看明白的人，似乎只有王弼和黄宗羲二人而已。例如，以旅卦上九言“鸟焚其巢，旅人先笑后号咷，丧牛于易”来说，就本卦看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有所理解，只有到其对卦（雷火丰）里才能找到答案。旅卦上离为“雉”，反转成丰卦，离居下，二至四互巽为木，转喻树上之鸟巢，离入互巽，是“鸟焚其巢”；旅卦下艮伏兑为“笑”，丰卦下震为“善鸣”之马，岂不是“先笑后号咷”？丰上卦之震，由坤变来，坤为“牛”，于田边界“丧牛”，初爻变而成震，因而说“丧牛于易（易，通“场”）”。又如“丧羊于易”，震变中爻成兑为“羊”，兑“丧”中间一易（古阳字）成震而没有“羊”象，正是“丧羊于阳”。又如大有卦六四爻辞说“匪其虺”，历史上只有虞翻主张是“虺”字，而多数人则作“匪其彭”。《左传》里有把“巫尪”（鼻孔朝天的残疾人）烧死以求雨的记载。看卦象，有互兑为“巫”，伏艮为“鼻”，离为“火”，正是把巫尪烧死之象，通

过“寻象”而知此“尅”字是原系之字，作“彭”字是错误的。又如否卦六三爻辞说“包羞”，从卦象上看，是用布包裹着寡发老妇的头，而解作“包裹熟肉”，就成了望文生义的笑话等等。许多事例都说明，解释卦爻辞的确是一个“寻言以观象”和“寻象以观意”的过程。一旦把卦爻辞解说明白，当然就可以“忘言”“忘象”了。在没有把卦爻辞解读明白之前，岂能“扫象”？

尚秉和先生的《周易尚氏学》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著，就是能多多采用西汉焦贛《易林》中所说之“象”。今天，如果我们能够依据《说卦》后面专说八经卦之象的内容，并结合《象传》的提示，仔细“寻象”，透过“象”去观察当初那位圣人写出卦爻辞的本意，把《易经》六十四卦的卦爻辞解说通顺，对《易经》的解读有所突破，这应该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大事。

历史上都说“十翼”是孔子的著作，似乎《说卦》也不会例外。可是，如果说《说卦》是孔子揣摩当初那位先圣的意图而写出来的，那么孔子的揣摩结果，能完全符合当初那位圣人事先所依据“观象系辞规则”吗？

为什么当初的那位先圣，能够前后一致而不相互矛盾地“观象系辞”？而今天用《说卦》里所说的八经卦之象，竟然能够通过“寻言以观象”和“寻象以观意”，把大部分的卦爻辞解读明白？

想来想去，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：今天所见到《说卦》后面说八经卦之象的内容，应该是非常古老的！

笔者的考证结果是：今天见到的《说卦》后面说八经卦卦象的内容，是秦汉之际已经失传，《帛书周易》里面没有，直到汉宣帝时才发现的内容，原先称作《卦下易经》。从表面上看，今天看到的《说卦》是“十翼”中最晚成书的著作，而从其后面的内容看，则又是最为古老的文字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文档名称：《《周易》（修订版）（上下册）》郭彧 注译.pdf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3765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